

生活与学习：为何要有大学？¹

路易斯·梅南德

杨妙艳 译 张宁曦 周忆粟 校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踏入大学，但是他们中有多少真正学到了东西？”

我的第一份教授职务工作是在一所常春藤大学。在那里，学生们乐于学，我们老师也乐于教。在当时我并不清楚社交活动会占有他们多少时间，有可能要耗费相当多的时间——但在我看来，学生们毫无障碍、诚心诚意地参与到学习生活中去。如果我的判断显得天真，也只能说是学生的足够礼貌没让我意识到实情。总之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质疑学习的重要性。

在某个时刻，学校决定不再聘任我，我们结束了合作关系。他们告诉我并不是对我个人有意见。不过很幸运，我在一所公立大学找到了教职。这所大学有 1.6 万名学生，教授们超负荷工作，还有一大群兼职教师。学生中有很多都是家庭中第一个大学生，因此，让他们分心的事情不是因为社交活动。他们中很多人在工作，并且要承担复杂的家庭责任。

我那时不把这些因素看作和我自己有关，就像我之前不觉得常春藤学校学生的社会活动和我有关一样。我给新学校学生分配同样的阅读任务。我了解这些新学生可能不会像我之前的学生那样有充足的准备，但是，或许出于信心也可能出于自尊，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他们应该学习哪些内容，为他们开启阅读的大门。在我开始教学不久后，一次课上，一个学生举起手，对于我指定的教材提出了疑问，“为什么我们要买这本书？”

以这种形式问这个问题，我只遇到过一次。然而在其他场合，我多次听到类似的问题，虽然没有涉及钱，“为什么我们要读这本书？”我知道这不仅是一个完全适当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学生们在要求我说明大学教育的投资回报。在此之前，我从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我并未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因为身处高等教育系统当中，我们将其价值视为理所当然。

我本可以说，“你阅读这些书是因为你是一个大学生，而这些是大学生应该读的书。”如果你从一种教育学理论出发，就可以理解我的回答。该理论是这样的：在一群人中，我们

¹ 译自《纽约客》2011年6月6日，原题为：Live and Learn: Why We Have College. 作者 Louis Menand.

很容易判断谁跑得最快，谁力量最大，甚至谁长得最好看。但是选出最聪明的人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聪明包含了很多无法用单一测试（比方 IQ 测试）来检验的因子。智力无法等同于百米赛跑。一个聪明的人，是一个思想开放敢于脱离常规思考的思想者，是一个有效的沟通者，是一个审慎的、敢于自我批评的、前后一致的人等等。这些品质都很难量化。

社会需要一个筛选机制将更聪明的人选拔出来，就如同田径队用秒表将跑得最快的运动员选拔出来一样。社会想早点识别出聪明的人，以便培养他们步入职业生活，最大化他们的才能。它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资源。大学正是这样一种综合而又细致的筛选工具。

大学，本质上来讲，是一个为期四年的智商测试。学生们需要在这个期间通过一系列课程展示他们的智力水平。如果他们马虎，不善于应变，或者招人讨厌——不管智商测试显示他们有多聪明——这些缺点都会反应在他们的成绩里。作为一项附加服务，学校也根据天赋对学生进行分类。比方说它将擅长数学与擅长诗歌的人分开。在流程的终端，毕业生获得一个分数，平均成绩（GPA）。专业学校和雇主把这个成绩作为智力和创造力的衡量标准。因此，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项考试对于每个参与的人大致相似。

我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回答。我本可以说，“你们读这些书是因为它们教会你关于世界和关于你自己的知识，如果你在大学里不学习这些，你在其它地方更加不可能学到。”这反应了有关大学的另一理论，该理论的逻辑是这样的：在一个鼓励成员追求职业路径，以获得最大的个人和经济回报的社会里，假定人们能够选择的话，他们将只学习那些能帮助他们获得成功的知识和技能。而那些成为知情公民以及有文化能反思的人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将没有动力去汲取。大学需要给未来公民传授关于启蒙和自强的知识，不管他们未来会从事何种职业。

在执行这一功能的同时，大学也让学生学会与人相处。它将不同背景和信仰的人聚集一起，让学生符合主流规范的理性和品味。大学容忍——甚至可以说赞赏独立思考，但是在被允许离经叛道之前，学生首先需要学会以可接受的方式行事。在理想状态下，我们希望每个人都上大学，因为大学使大家具备基本共识。它在为社会生产想法类似的成年人。

如果你倾向第一种理论，那么重要的就不是教何种课程，甚至也和课程内容无关，重要的是课程的严谨性，因为这样才能保证选拔机制的有效运作。如果你偏向第二种理论，那么

你会视成绩为一种辅助的激励工具，而唯一真正重要的是学生能学到东西。有些内容是每个成年人都必须知道的，大学是灌输这些内容的最佳传达系统。

自 1945 年以来，美国的高等教育同时在执行这两种理论，这造成了很多的混乱。教育系统被设计为同时具有择优录取（理论 1）和民主（理论 2）的特性。专业学校和雇主依赖大学筛选合格人员进入工作场所，当政客同时也在宣传大学作为民主条件的重要性。我们希望高等教育可以对每个美国人敞开大门，但也希望学生的成绩和他们的努力相符。

历史上情况却有所不同。在 1945 年以前，培养精英的私立大学例如哈佛和耶鲁主要担负对特权社会阶级再生产的功能。1906-1932 年期间，格罗顿（Groton）中学共有 405 名男孩申请了哈佛大学，402 名被接收。1932 年，耶鲁大学收到了 1330 封申请，接收了其中的 959 名——接收率为 72%。接近三分之一的录取者是耶鲁毕业生的儿子。

1948 年，通过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莱恩·康纳特（James Bryant Conant）等人的努力，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成立了，标准化考试（SAT 和 ACT）很快成为从高中筛选人才（不考虑学生的家庭背景）进入高等教育体制的普遍方法。康纳特视高等教育为有限的社会资源，他希望这一大门的准入制度更难一些。考试保证只有那些有资格读大学的人才能进大学。父亲是哈佛大学毕业生不再能保证儿子进哈佛。1940 年，哈佛大学的录取率是 85%。到了 1970 年，接收率为 20%。去年，35000 学生申请了哈佛，只有 6% 的学生获得了入学资格。

今年，几乎所有的顶尖大学的申请人数都急剧增加，部分因为这些大学的招生宣传更加声势浩大，生源也更加国际化，接收率也随之降低。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录取率低于 8%。筛选程度是非常激烈的。对比之下：剑桥是录取率是 21%，牛津是 18%。

私立大学越来越挑剔，公立学校则变得越来越容易进入。从比例上来讲，自 1945 年以来，高等教育的扩张绝大部分来自于公立大学的扩大。在 1950 年，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学生数目差不多，几乎都是 114 万。到了今天，公立学校共计招收 1500 万学生，而私立学校则不到 600 万。

现在，几乎每个拥有高中毕业证书的人都能在大学找到一席之地。纽约城市大学（我早前的工作单位）有 22.8 万本科生——比整个常春藤学校本科生总数的四倍还多。最大的公立高等教育区，加利福利亚州，拥有 10 个分校，23 个州立学院，112 个社区大学校园，以

及超过 330 万学生。美国目前人口的 6% 都在接受本科或者研究生教育。在英国和法国，这一百分比是 3%。

如果你支持理论 1，你会担忧：这么多的美国人去大学读书，本科文凭正在丧失其意义，不久之后，它将不再是潜在生产效率的可信凭证。因为有了让每个人都接受高等教育的目标，增加对大学教育的公共投资——在效果上，等同于纳税人助长了全社会晋升——这正在威胁着大学的筛选功能。教育应该是起筛选的作用，而不是为了包容。

如果你支持理论 2，你会担忧为在顶级大学就读的竞争正在歪曲教育的目的。你会觉得这是教育领域里的泡沫：学生和家长正在高估大学作为一个商品的价值，而这件商品有大量而廉价的替代品。普林斯顿或者斯坦福的费用，包括住宿费，每年要超过 5 万美金。公立大学则要便宜多了——平均学费是 7605 美金——还有很多入学门槛不高的私立大学能让人获得好的教育，那里的老师有更多和学生见面的时间。去这些学校不需要你高中期间分分秒秒都讨好老师，也不需要不断美化你的个人简历。教育是为了人格和智力的增长，而不是赢得某种比赛以获头名。

也许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尽管有以上担忧，在既定的相互矛盾的教育目标下，美国高等教育正在做美国人想它做的事。大学教育越来越普及：现在 68% 的高中毕业生都能进入大学（在 1980 年，这一比例只有 49%），雇主一如既往地看重学历：这意味着部分筛选机制还是存在。2008 年，拥有高等学历文凭（包括硕士、专业文凭和博士）的人平均收入为 83144 美元；本科文凭为 58613 美元；高中文凭仅为 31283 美元。

美式高等教育日益成为全球需求。全世界的学生都想来美国大学念书，部分美国大学，包括纽约大学和耶鲁大学，正在建设海外校园。高等教育被广泛视为争取更好生活的途径。偶尔有人指出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是大学辍学生。但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大部分都不是比尔·盖茨或者马克·扎克伯格。

但是，高等教育系统有可能只是看上去运作良好而已。大学可能是在筛选，学生们可能获得了念书的机会，雇主可能是在肯定大学的作用，但是学生真正学到了东西吗？最近有两本书揭示了学生们并没有学到东西。两本书的观点相当有力。

《不学无术》（Academically adrift）是两位社会学家，理查德·阿如姆（纽约大学）和乔斯巴·罗克萨（佛吉利亚大学）合著的作品。全书几乎有三分之一（68 页）是方法论附

录，普通读者大概能从中猜想到这本书的风格。《不学无术》并不是一本基于个人轶事和非系统数据的谴责著作（很多批判美国高等教育的著作都有这个问题）。它是一部探讨学生是否在学习大学所声称传授的知识的社会科学著作。具体来说，这本书要探讨学生是否在学习“批判性地思考，分析性地推理，解决问题以及清楚地沟通。”

阿如姆和罗克萨认为理论 1“过于愤世嫉俗”。他们认为高等教育的工作是教书育人，而不仅仅是将他们分类并且放到职业阶梯上。他们认为有的人的确因为能力所限而没法在大学里学到很多东西。但他们认为大学生应该能够为他们所付出的时间和金钱展示出一些成果来。

这两位作者指出，虽然对于高等教育问责制有诸多讨论，但是没有人愿意去做一次具体评估，因此，他们去做了自己的评估。他们采用了“大学学习评估（CLA）”测试。测试包括三个部分，尽管他们只用了其中一部分，也即表现能力（performance task）的数据。举例来说，学生们被要求建议“某一雇主是否购买最近某款失事飞机”，在提供相关的文件，如新闻报道，FAA 的事故报道，图表等之后，要求学生写备忘录。之后研究者对备忘录进行评分，评分的标准着重四个方面：批判性思考能力，分析推理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以及写作能力。

2005 年秋季，2000 多新生参与了这一测试，2007 年春季，这 2000 多学生再次参加了测试。阿如姆和罗克萨发现，45% 的学生没有显著提高。他们由此作出结论：“大部分学生通过美国高等教育很少或者几乎学不到东西。”

这一研究设计引发了很多问题，从以三个学期来评价大学学习成长是否有道理到测试本身的可信度。首先最明显的推论就是测试本身有问题。而且，即使这个测试能够准确地测量某些技能，结果并不能说明学生是否获得了某些他们大学之前所不具备的知识或者符合社会期望的态度。

我们还有其他的理由对此书的结论表示质疑。一般认为（至少是教授们的普遍观点）学生能力在大学二年级之后有质变（尽管阿如姆和罗克萨在著作完成之后做了一项追踪研究，并断定，在 4 年学习后，36% 的学生“大学学习评估”成绩仍然没有显著提升）。但是，在统计学意义上，什么才是“显著”是由研究者设定的。亚历山大·阿斯汀（Alexander Astin），现代高等教育研究的院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现在的退休荣誉教授，在《高等教育纪事报》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中对阿如姆和罗克萨的方法论，尤其对于 45% 的大学学生没有提高这一论断的统计学基础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即使将“大学学习评估”结论置于一旁，《不学无术》仍然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阿如姆和罗克萨指出，当今许多大学生将大学视为一种社交体验。比如，学生学习的时间比过去明显减少。1961 年的时候，学生汇报平均每周学习时间为 25 小时，现在为 12-13 小时。在阿如姆和罗克萨的研究中，超过 1/3 的学生每周学习的时间不到 5 小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次调查中，学生每周花 13 个小时学习功课，43 个小时用于社交和各种形式的娱乐活动。

在时间使用上，很少有人是完全可信的报导者。但是如果学生学习时间减少，可能是因为对于他们的要求在降低。研究中有一半的学生报告，在过去一个学期中没有选修过一门要求 20 页以上写作任务的课程。1/3 的学生报告，他们没有选修过任何一门每周阅读量在 40 页以上的课程。阿如姆和罗克萨指出，教授几乎没有动力去加大课程的难度。教授们指出，教学中唯一有影响力的是学生的课程评估，因为这些能影响终身教职和升职决策。因此，教授们倾向于将他们的课程变得满足学生口味，没有太繁重的作业。教授们可不是傻子，一项于上世纪 90 年代开展的研究指出（很巧合的是由亚历山大·阿斯汀所做的）教员对教学的专注程度和他们的收入呈负相关关系。

但是，阿如姆和罗克萨相信有些事情还是有帮助的。首先，那些为读大学而做好准备的人，不仅初入大学时表现好；步入大学之后，他们进步非常可观。那些选修每学期写作量超过 20 页以及每周阅读量超过 40 页课程的学生进步也更大。

最有意思的发现是：基础学科（liberal-arts）的学生——就读于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学科的——在“大学学习评估”考试成绩中相对非基础学科的学生（比如商学、教育、社会工作、通讯、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和健康等专业）而言成绩更好，进步较大。这个结果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基础学科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有大量阅读和写作的课程；他们更有可能去更好的大学，而不同大学之间筛选强度的大小和学习效果呈正相关；他们大学之前训练更好，使得他们更有可能获得进步。那些得分最低并且进步最小的是商专业的学生。

然而，美国 60% 的大学生不在基础学科专业。美国人数最多的专业，是商学。商学文凭占了全美国 22% 的本科文凭。10% 是教育，7% 是医疗相关专业。每年颁发给园林、休闲、娱

乐和健康研究等专业的文凭是哲学和宗教的两倍多。从 1970 年开始，高等教育越扩招，基础学科缩水的比例就越厉害。

理论 1 和理论 2 都没法解释教育体系对非基础学科专业学生的意义。对这些学生来说，大学基本上是职业培训和提供证书服务的供应商。有一种理论能够解释他们面临的情况——理论 3——发达经济体要求专业知识和技能，既然高中只是提供概括性的教育，大学就成了进入职业领域前的培训场所。非基础学科的大学文凭作为一种信号机制向雇主传递了员工在职业技能方面的胜任程度。

理论 3 解释了非基础学科教育的发展。当工作变得越来越高科技化，雇主需求更多的人获得专业训练。它同样解释了专业硕士项目的激增。目前有超过 100 种硕士项目，领域从鸟类医学到网页设计再到国土安全。每年颁发的硕士文凭是博士文凭的 14 倍。当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阿尼·邓肯（Arne Duncan，译者注：美国教育部部长）谈到高等教育是美国未来经济之关键时，他们所设想的就是这个部门。他们并非讨论基础专业。

即便如此，那些修读职业文凭的学生基本上都被要求选修一些基础学科课程。假如你想在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修读厨艺管理方面饮品管理专业的本科学位，为获得此学位，学校会要求你上两门英语课（写作和世界文学），一门哲学课，一门历史或者政治科学课，若干化学、数学和经济类课程，以及两门艺术和人文类选修课。如果你的职业目标是在贝百乐宫大酒店（Bellagio）经营饮品服务，你会花多少精力在世界文学的课程上？

下面轮到 X 教授出场了。X 教授是一个化名，他在过去的 10 多年中坚持夜间在一所叫“Pembrook”的 4 年制私立学校和一所叫“Huron”的州属社区公立大学当兼职教授（他白天在政府部门上班）。这些学校学生的学习动机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就是为了找工作。他们中大部分想获得注册护士或者州警官之类的工作，而这些工作要求大学文凭。他们只想从 X 教授那里获得一样东西：课程及格。

几年前，X 教授在大西洋周刊上的一篇文章里谈论了他的个人经历。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他的“时代”专栏里提到了这篇文章，并引发了一场小的电子风暴。该文最后得以在维京出版社出版，书名叫做《在象牙塔的底端》。该作者（X 教授）拥有艺术创作的硕士文凭（他教授写作和文学），他以尖酸自嘲的回忆录形式进行写作。他有时对于同事尖酸刻薄（对他的学生还好），但他非常聪明，而且大体上人不坏。《在象牙塔的底端》

的故事同斯蒂芬·阿基（Stephen Akey）《大学》（1996）——一个讲述本科生在格拉斯堡罗州立学院（Glassboro State College）不幸遭遇的故事——有着相似的魔力，尽管《大学》更幽默。

X 教授将其个人从事教学与其生活插曲——包括购买了一栋超过实际购买力的房子而导致之后的婚姻紧张——缠绕一起。关于生活的部分太过模糊，以致没有吸引力。如果作者要写忏悔录，那么需要提供更清楚的细节。我们没法知道 X 教授住在哪里，他的妻子是做什么，他的儿子长什么样子，或者关于他的其他信息。本书作者显然享受化名保护之乐。必须承认，《在象牙塔的底端》是一本基于个人轶事和非系统数据的关于高等教育的著作，但这个故事值得一听。

X 教授认为，他大部分的学生并不具备进入大学的资格。他觉得，从写作和文学的角度而言，他们根本不可教。但是教育体系推动他们走入这个人力资本生产流程。他们步入大学要不就是因为工作要求文凭，或者他们被“人人都要上大学”之类的标语所迷惑。X 教授认为这同房地产泡沫有相似之处：美国人被鼓励投资于一些他们支付不起而且不需要的东西。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州警官为什么要通过一个大学水平的文学课程？想展示你能跟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译者注：著名作家）干上一架？正如 X 教授所展示的，这就是过度选拔的例子。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低效的。X 教授指出，有一半进入大学的美国人从未完成学业，几乎 60% 读两年制大学的学生需要发展型课程（也就是补习课程），美国大学教员低于 30% 拥有终身教职。最后一个数据是由美国教师联合会（AFT）提供，可能有所低估，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美国大学里，超过 50% 的教学任务是由像 X 教授这样的临时（兼职）教员完成。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如果由终身教授讲课，学生会学到更多。X 是兼职教授，但他也是一个非常负责的老师，每个阅读此书的人都能感受到学生对他的尊重。X 教授转载了一些对他课程的评价，总结了他教学的基本情况：

“课程比我预期的要好。在此之前，我从不会主动阅读一本书。但是现在我几乎有了拿起书阅读的冲动。我非常喜欢 X 教授。这也是我为什么选修这门课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是他在教。大部分人都对不感兴趣的东西能让他非常着迷，这使得三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X 教授认为“后现代思维模式”，以及大多女性在大学担任教职的事实造成了上述情况。这造成了“教员集体无意识的女性化”。他偶尔批判学术领域的写作和修辞，认为严谨度低，都集中到唤醒觉悟（consciousness raising）上了。这似乎有点偏题了。X 教授本人的教学法比较老派，他给分也十分严格（他曾经在 15 个学生的班级中，让 9 个学生挂科）——而他的学生也并不好教。

当 X 教授没有批判现代思潮的时候，他十分清楚为何教会准备不足的学生进行写作会很艰难。“我觉得，”他说，“成为一名好作家的并不是非常奥秘的事情，只要满足两个最关键条件就行了：（1）在一生中阅读量足够，领悟书面语的节奏；（2）有能力模仿这种节奏。”这很有道理。如果你阅读了足够量的句式，你就会开始思索这些句式；如果你开始思索句式，你就能够自己组织造句，因为你知道句子的形式。当一个人在十八岁或者二十岁的时候还没有成为一个好的读者，怎么可能指望他/她在 15 周之内成为作家？另一方面，学习写作的人关注那些“大部分人不感兴趣的事物”并非坏事。大部分的教学本来就是规范。

X 教授随后在大西洋周刊发表了续文来推销此书。他负担起了一个使命，反对大量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修读基础学科课程。他认为那些不具备条件修读大学的学生应该有接受职业教育训练的选择权。他们永远不会学会如何阅读亨利·詹姆斯；他们也永远写不出像亨利·詹姆斯那样的精彩作品。那为何他们必须接受这样的训练？

这就是所谓教育分流的办法。不必等待 20 年让体系将部分人剔除出局，也不必将资源浪费在那些不会接受本科以上教育的学生身上。应该早早做一个决断（早至中学），将部分学生引导进学术的路径，为他们提供开放的教育，而其他的则进入专业或者职业路径。这是西方高等教育史上过去通行的做法。现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仍然遵循此道。

直到 20 世纪之前，美国也使用这个方法。在 19 世纪，一般而言，大学文凭并不是读法学院或者医学院的必要前提，大部分法学院医学院学生也不会费神取得大学文凭。将大学文凭变为进入专业学院的前提条件可能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改革。通过使专业教育的门槛抬高，它提升了专业的地位，并使基础学科院系免于衰退。这也是为什么基础专业教育是大学教育里的精英类型：它将你引领至高社会地位的职业。这也是世界其他地方所向往的美国式高等教育。他们要的是文科和科学类教育。

假定以上新书没有说错（这并非十分确定的假定），即许多学生对大学教育的专业学习部分并不专心，那么原因可能是这个体制太大、差异性太强而没法使身处其中的每个学生都同样受益。这一体制似乎吸引了大量没有明确职业目标的人，但却没能为他们找到定位。这是阿如姆和罗克萨所相信的。在顶尖大学里，学生们是最有学习动机的——动机是他们能够被选中的原因之一——而大部分力求事事做好的教授，也希望能够改变学生的命运。一旦动机消失，当学生不相信大学生活的重要性，就很难改变他们的思维。

如果学习动机日渐消减，它可能意味着美国高等教育史的辉煌时期将走向终结。这段辉煌时期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并持续了 50 年。此间，大量的新人口不断进入大学系统。首先，根据退伍军人安置法案（G.I. Bill），1944-1956 年期间，有 220 万退伍士兵步入大学学堂。紧接着是 60 年代的教育大扩招：40 年代婴儿潮一代的学生此时大量步入大学，入学人数增加两倍。再之后就是混合教育，除了军事院校，所有的男校都开始接收女学生。最后是在 80 年代到 90 年代期间，大学里消除了种族和族群隔离。

这些学生并没有将大学教育看作是走过场。相对于早期格罗顿毕业生，教育对于他们利害关系大得多。（你觉得格罗顿的学生会花费多少时间在功课上？）大学曾经是这么一个门槛：它只允许特权阶级通过。突然间，大门敞开：给老兵、给经济萧条时期没法负担大学教育的那些父母的孩子们、给被排除在许多名校之外的女性，给被排斥被忽视的非白人群体，给为了让孩子接受大学教育而到美国的移民的孩子。对于这些群体，大学是成功的核心——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还是社会意义和个人层面上的。他们终于分到一杯羹。大学就应该是需要刻苦的地方。大学要求的刻苦程度是它所带来的改革力量的象征。

这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买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提问的学生并非在抱怨。他试图去了解这一魔法过去是如何运行的。我（理论 2 的支持者）很好奇现在那所大学的学生是否仍在问这个问题。